

鄉土社會與中國現代性

——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再評價

• 高力克

鄉建運動萌生的時代氛圍

鄉村建設運動是本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重要一幕。這場運動的領袖人物梁漱溟，是現代知識分子中一位獨具風格而集思想家與改革者於一身的人物。作為現代中國「最後一個儒家」(艾愷語)，梁秉承士人的聖王情結和踐履性格，面對近代中國之社會政治秩序和價值符號系統解體的危機，他不僅苦心建構了儒學復興的文化理論，而且將其付諸於社會改造實踐。鄉村建設即梁尋求鄉土中國與儒家文化重建的實踐。

古典中國的倫理文化與鄉土社會是一個相互依存的共生體。晚清西力東侵以降，儒家文化隨着傳統社會政治秩序的解體而日趨式微，鄉土社會亦因列強經濟侵略和軍閥戰亂而日形凋敝，鄉村建設運動即起於「救濟鄉村」。同時，大革命的失敗繼辛亥之後再度凸顯了中國現代化的範式危機，時人有「英美模式」與「蘇俄模式」業已破產的論調。這種革命危機為改良主義留下了空間。梁的鄉村建設運動也是起於對中國現代化運動之西方模式和蘇俄模式之困境的回應，由此而有由西方化而中國化、由城市文明而鄉村文明、由政治革命而社會建設的「新覺悟」。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是起於對中國現代化運動之西方模式和蘇俄模式之困境的回應，由此而有由西方化而中國化、由城市文明而鄉村文明、由政治革命而社會建設的「新覺悟」。

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的形成有着時代思潮的特定背景。20年代以來，鄉村和農民問題逐漸為社會所關注。五四以後，以章士釗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力倡反工商文明、反都市文明的「以農立國」論，知識界關於「農國」與「工國」之爭持續了數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開始將民主革命戰略重心轉向鄉村土地革命，使國民革命中崛起而為中國現代革命之重要資源的農民運動更為引人注目。而鄉土中國的日漸凋零，則使「今日中國朝野上下都已注意到鄉村建設」^①。南京政府成立了「農村復興委員會」，而各式社會教育改良團體也紛紛轉向鄉村，如



梁漱溟的鄉建理論要旨，在於鄉土中國與儒家文化的重建。圖為30年代中國面貌。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中華職業教育社和華洋義賑會等團體的鄉村改革，構成了一幅複雜的鄉村改良運動圖景。同時，自五四以來成為中國知識界主流思潮的社會主義，並未因大革命的失敗而退潮。20年代末隨着蘇俄啟動計劃經濟而進入現代化經濟起飛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有增無減，這從上海《申報月刊》1933年薈萃知識界名流的「中國現代化問題討論」中，可見一斑。梁的鄉村建設思想自有其深刻的原創性，但其畢竟難出時代思潮的格局。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想發萌於五四以後，歷大革命時期而至1928年臻於成形。其後梁投身鄉建運動，一邊從事著述，從1932年至1937年，相繼出版《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和《鄉村建設理論》，系統闡述了其鄉村建設理論。鄉村建設是梁對中國西方式現代化運動之困境的回應。在他看來，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政治脫序和社會解體，而其實質則為儒家文化失範的「文化失調」，幾十年來中國現代化運動之所以缺乏根基，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其原因蓋出於此。而梁的鄉村建設的宗旨，有社會和文化兩層涵義：一方面，「鄉村建設運動，實為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或可云

一種建國運動」^②。另一方面，鄉村建設還意在「從創造新文化上來救活舊農村」^③。質言之，鄉村建設的宗旨在於鄉土中國和儒家文化的重建。

鄉村建設的烏托邦工程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構想以其獨特的中西社會分析為理論前提，這一社會理論是他東西文化理論的社會學和歷史學的展開。梁指出，中國社會是一個鄉村社會，鄉村就是中國文化的根基。鄉土中國之社會構造的基本特徵是「倫理本位」與「職業分途」。中國「倫理本位」的社會本乎倫理為秩序，其表徵為人倫禮俗、共財經濟和德教政治。而中國社會的「職業分途」，則表現為無財產和權力壟斷，士農工商各謀前途而流轉相通，未形成階級對立局面。中國社會的這種倫理本位、職業分途，與西方個人本位、階級對立的社會結構迥然相異。西方社會的個人本位和階級差別，源於其特定的宗教和政治的團體生活和等級社會。中國倫理化、職業化的社會秩序賴於教化、禮俗和自力以維繫，而教化、禮俗、自力皆本乎「理性」（道德理性）。鄉村和道德是鄉土中國的兩大根基。古典中國社會由於其倫理化和職業化而具有高度的調和性，使其社會構造歷久不變而盤旋不進，千百年來只有治亂循環而無革命。近代中西交通以來，鄉土中國的社會構造漸趨解體。這種傳統社會的解體，表明中國文化在西方現代性挑戰下的失敗。中國的失敗在於其社會的散漫、消極、和平、無力，而中國文化的最大闕失在於缺乏西方式的「科學技術」和「團體組織」（民主）。

中國文化之根在於鄉村和倫理，因而旨在重建鄉土社會和復興儒家倫理的鄉村建設運動，則是「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後覺悟」，也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唯一選擇。

鄉村建設道路是梁漱溟對晚清以降中國現代化運動批判反思的產物。在他看來，近代中國仿效西洋的現代化運動之所以屢試無效，原因在於其悖離和破壞了中國社會文化的根基。幾十年來歷次變革運動造成中國政治脫序和社會解體，「中國社會在失其自身原有組織條理時，更失去其應付環境的能力」^④。中國社會病在散漫，救治之道在於「團結組織」。而近代以來從外域舶入之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和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不僅與「團結」的時代要求背道而馳，而且與崇尚「和諧」的中國精神傳統適相悖反。梁認為，一種新文化、新制度的創造必須從舊文化、舊制度轉化而來，從老根上生長新芽。離開傳統文化和制度的「根」，只能徒有破壞而難收建設之功。中國文化之根在於鄉村和倫理，因而旨在重建鄉土社會和復興儒家倫理的鄉村建設運動，是「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後覺悟」，也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唯一選擇。

鄉村建設的具體構想，是建設一種新的鄉村自治組織。梁設計新鄉村組織的基本原則是：鄉村建設所要建設的新型社會組織是一種「新禮俗」，這種「新禮俗」就是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為具體事實的溝通調和」^⑤。質言之，也即由中國倫理精神與西方民主精神相融合而建設一種新型禮俗化的社會組織。這種「新禮俗」的建設必須本諸中國傳統社會之根——「理性」和「鄉村」，「從這根上來生長新芽」。梁「新禮俗」的設計以中國古代「鄉約」為藍本。他之鍾情於「鄉約」，在於其充滿「倫理情誼」和「人生向上」的中國文化精神，以及其集教育（社學）、經濟（社倉）、政治（保甲）之功能三位一體的組織形式。鄉

村建設的「新禮俗」即「鄉約」補充改造的現代版。這種新鄉村組織的具體形式是「鄉農學校」(鄉學、村學)。鄉農學校由校董會、校長、教員和學生組成。校董會由鄉村領袖出任，從校董中推出一校長主持教育，教員為從事鄉村建設的知識分子，學生則為全體成年農民。鄉農學校具有四種作用：學長的監督教育作用，教員的推動設計作用，學眾(鄉民會議)的立法作用和學董的行政作用。鄉農學校不是西方式法理化的契約組織，而是本乎中國倫理精神的新禮俗組織。梁相信，源於中國傳統的新型「禮」文化將成為高於西方現代「法」文化的人類新文化。同時，鄉農學校也是一種新政治組織，其融合中國倫理精神和西方民主精神的「人治的多數政治」，應是「中國的民主政治」的雛型。鄉農學校承襲了「鄉約」之集教育、政治和經濟於一體的綜合功能。它還將引導農民入合作社，並向其傳授科學技術，以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梁對這種鄉村自治組織頗為樂觀，稱「我們的鄉村組織是理想社會的一端倪、一苗芽，預備從這裏重建中國文化」^⑥。

鄉村建設作為梁漱溟解決中國問題的政治設計，採取了一條非政治化的社會改良進路。梁認為，鄉土中國社會構造的支點歷來在社會而不在政治，而值此近代以來政治脫序的過渡期，中國問題的解決唯有自下而上反求於社會，從社會入手而收效於政治。中國是一鄉土社會，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資源在於鄉村。「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於完成，全在其社會中知識分子與鄉村居民，打併一起所構成之一力量」^⑦。近代一切改革運動的失敗，皆在於知識分子之上層動力與農民之下層動力的隔絕。而鄉建運動則是聯結知識分子和農民之上下層動力的唯一進路。梁對中共的農民革命持反對態度，認為其失在不認識倫理中國社會之和平散漫的特質，和中國革命之民族自救性質及其由破壞而建設的演化趨向，而一味蹈襲外國階級社會中農民階級鬥爭的舊套。而他的鄉建運動才是「以建設完成革命」的農民運動的正途。鄉村建設取「理性」的文化運動進路，立於在野地位而超居武力之上，從鄉村自治組織入手，以為未來中國新社會的萌芽，由小及大漸次發展，最後達致以社會代政府，實現新的理想社會。

在經濟建設問題上，梁漱溟的基本方針是：「以農兼工」和「由散而集」。他認為，鄉土中國不能走西方從商業到工業的自由市場式的工業化之路，而必須立基於鄉村，「由農業引發工業」，「農業工業疊為推引，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鄉村可為工業發展提供充分的勞動力、資金和市場資源。加之中國人多地少，鄉村勞力過剩，「農民兼事工業」更為大勢所趨。有鑒於西方工業國過度工業化和畸型都市化的流弊，中國發展應「工業向鄉村分散，農業工業相結合，都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⑧。另一方面，散漫的鄉土中國應走合作經濟的道路，組織農民「由散而集」，這種農民合作既是中國工業化的前提，又是達致為消費而生產和經濟生活社會化的理想經濟制度的途徑。梁同時強調，中國的農民合作經濟應避免蘇俄公有化之弊端，兼顧社會與個人，保護農民土地私有權，做到既「由散而集」，又「集中有散」，於西方式個人主義和蘇俄式集團主義之間求中道。

鄉村建設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既是古典鄉土中國「轉消極為積極」的復興，

梁對中共的農民革命持反對態度，認為其失在不認識倫理中國社會之和平散漫的特質，而一味蹈襲外國階級社會中農民階級鬥爭的舊套。而他的鄉建運動才是「以建設完成革命」的農民運動的正途。

又是對西方工業文明「轉偏敬為正常」的超越。梁描畫的新社會藍圖，超越了工業西方之工農分離、城鄉懸隔、物支配人、群己對立、法律至上等偏弊，它將是這樣一個綜合中西而創新的理想社會：「農業工業依乎順序適宜配合：鄉村為本，都市為末，二者調和溝通；人為主體來支配物：不落於個人社會兩極端，而是倫理本位合作組織；政治經濟教育三者合一不分；理性替代武力，教育居於最高領導地位。」^⑨梁相信，這種超越西方文明的理想的人類新文明，將率先在東方鄉土中國實現。

鄉建運動遭受的困頓與批評

30年代，梁漱溟在山東軍閥韓復榘贊助下於鄒平縣實施其鄉村建設計劃。鄒平的鄉建實驗歷時數載，儘管亦不無成效，至1937年已在山東境內70縣推廣，但這並不能掩蓋鄉建運動的內在困境。1937年，梁慘淡經營多年的鄉建運動，終因內外交困而在抗戰的硝煙中歸於失敗。

關於鄉建運動的困境，梁本人也不無省悟。他曾對其鄉建幹部談到鄉村建設的「兩大難處」：一是「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二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他承認：「既說社會改造，那就不應當接近政權，依靠政權。」「你就應當奪取政權來完成社會改造！你既不否認他，而又順隨他在他底下活動：那末，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麼能完成社會改造呢？」「我們要求社會大改造，而實際上靠現政權作事，這是一個大矛盾！」^⑩另一方面，鄉建運動與農民之間又存在着嚴重隔閡，「此足見我們未能代表鄉村的要求！」^⑪「我們是走上了一個站在政府一邊來改造農民，而不是站在農民一邊來改造政府的道路。……我們與農民處於對立的地位。」^⑫梁承認，與農民「從心理上根本合不來」是鄉建運動「最苦痛」的問題。這除了知識分子與農民天然的心理隔膜外，還有現實的原因，例如「農民沒有土地，我們不能分給他土地。他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從政治上解決，而在我們開頭下鄉工作時，還沒有解決政治問題的力量。那麼，當然抓不住他的痛癢，就抓不住他的心。」^⑬這種「與政府應分而不分」、「與農民應合而合不來」的窘境，表明了鄉建運動深刻而難以克服的內在危機。

與其五四時期的名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問世一樣，梁漱溟的鄉建運動在30年代再度成為輿論批評的焦點。對梁的批評主要來自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以《獨立評論》為陣營的自由派的批評，集中在「重工」與「重農」問題上。吳景超批評鄉建派的「以農立國」論，針鋒相對地提出「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⑭；陳序經對梁將鄉村文化和鄉村制度過分理想化大不以為然，認為新文化的創造恰恰有賴於都市而非鄉村，「中國的鄉村應該徹底與全盤的西化」^⑮；賀岳僧則將鄉村建設歸為開歷史倒車的「保守主義」。以千家駒和李紫翔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出版了《中國鄉村建設批判》文集，在「革命」與「改良」問題上與梁展開論辯。千指出，中國問題的實質不是文化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問題，梁以孔學為其哲學基礎的鄉村建設，其先發明一套禮俗而後改造經濟政治組織的

關於鄉建運動的困境，梁本人談到「兩大難處」：一是「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二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這種「與政府應分而不分」、「與農民應合而合不來」的窘境，表明了鄉建運動深刻而難以克服的內在危機。



三十年代從事鄉村建設的梁漱溟

進路，是本末倒置的：鄉土社會不是「整個鄉村」，而是有階級差異的，那種粉飾鄉村階級矛盾的「相親相愛」的「鄉學」「村學」，如果不是烏托邦，也只能代表地主豪紳的利益；在半殖民地中國，無論「鄉村建設」抑或「工業建國」，都不過是沙漠建廈式的空想，中國的出路唯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此外，漆琪生等學者既對農業重心建設表示贊同，也批判了梁等鄉建派的「人心本位之農村建設的方式」，認為這種不觸動生產關係根本改造的「心理改造式」的農村建設運動必歸失敗。

應該說，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分別切中了梁漱溟鄉村建設之保守取向和改良主義的要害。平心而論，梁是二十世紀中國關注鄉村和農民問題的少數思想家之一，其鄉建理論關於鄉土中國社會的分析和中國現代化動力的見解，無疑遠在同時代自由主義西化派之上。然而梁的卓見並不能掩蓋其深刻的思想矛盾。他關於「中國」和「人生」問題之深切的孿生關懷，使其對現代性持欲迎又拒的矛盾心態，因而儘管他的鄉建目標是鑒取西方「團體組織」和「科學精神」、調和中西精神而創造中國新文化，但其以鄉村文化為本位而反商品經濟、反都市文明和反法律文化的價值取向，又使其鄉建計劃具有濃厚的保守主義復古傾向。鄉村建設的困境源於其深固的儒學性格。梁強烈的儒家式人文關懷和思想進路，限定了他對中國現代化問題所作的反應。

關於中國問題的癥結，梁時而也意識到「政治問題實為總關鍵」^{①⑥}，但他更傾向於將其歸為「文化失調」，認定近代中國的社會解體和政治脫序皆為「文化失調」的表徵。因而在梁看來，「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靠政治的力量，否則解決不了。可是為經濟主體的還是在人。」「如何讓人活起來？則需發動中國人的精神。」^{①⑦}這樣一來，中國問題最終就被歸結為儒家式的「精神問

儘管梁漱溟的鄉建目標是鑒取西方「團體組織」和「科學精神」、調和中西精神而創造中國新文化，但他以鄉村文化為本位而反商品經濟、反都市文明和反法律文化的價值取向，又使其鄉建計劃具有濃厚的保守主義復古傾向。

題」、「文化問題」，而解決中國問題「其最高動力就在人類的向上心，可說原是一個道德問題」^⑩。當現代中國的危機被歸結為春秋戰國式的「禮崩樂壞」時，復興儒家禮樂的鄉村建設就成了救治中國危機的藥方。梁試圖通過這種復興古代「鄉約」的溫和的「新禮樂運動」，以非政治化的「文化運動」方式而謀收「建國運動」的政治之功，最終以新禮俗社會「把現政權替下來」。這種儒家式「修齊治平」的聖王進路，在二十世紀中國不啻是一廂情願的迂闊幻想。而鄉建運動的最大悲劇，在於「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它暴露了鄉村建設與農民隔閡的士人運動的實質。耐人尋味的是，與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相比，梁以儒學「大傳統」的目光看到了中國「整個鄉村」的倫理「和諧」，並力圖以「理性」開發復興農民的道德精神；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則着眼於農民「小傳統」，看重中國農民「最富於革命傳統」的鬥爭性格，和其自古以來改朝換代的巨大潛力。當梁抱怨農民的致命弱點是「貪圖近利」，鄉村建設切忌「以利誘鄉下人」而需着眼於復甦「農民的精神」時，他始料未及的是，正是這種令其鄙夷的農民的物質利益和生計問題，將成為中國現代革命的深厚動因。如果說儒家的「王道」即便在古代亦不過是從未實現的烏托邦；那麼梁立基於道德理性的鄉村建設計劃，在現代中國因匱乏運作功能而失敗，自然是不難想像的。誠如梁的傳記作者艾愷所言，梁最終失敗的關鍵原因，是「或許他始終沒能切中同時期歷史發展的主題」^⑪。

梁試圖以非政治化的「文化運動」方式而謀收「建國運動」的政治之功，以新禮俗社會「把現政權替下來」。這種儒家式「修齊治平」的聖王進路，暴露了鄉村建設與農民隔閡的士人運動的實質。

中國現代化及其人文代價

梁漱溟鄉村建設計劃的思想困境，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現代化的文化難題。西方文明的東侵，使古典中國同構共生的鄉土社會和倫理文化日趨衰微解體。求解與此並生的社會秩序危機和文化價值危機，成為近代中國「保國」與「保教」二律背反的悲劇性文化難題。梁秉承的儒家「經世」和「弘道」的孿生關懷，使其執着於「中國」（社會）問題和「人生」（意義）問題，而苦苦求索鄉土中國和儒家文化的復興。這種尋求「中國」和「人生」兩全的探索，不能不使梁陷入了二難抉擇的困境。這種思想困境在梁表現為歷史理性與價值理念之間深刻的內在緊張。一方面，梁關於中國出路的求索，使其體認了西方文化所表徵的現代化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他關於人生意義的思考，則執着於古典中國的人文價值和精神傳統。這樣，梁在歷史理性層面對現代性的有限認同，就不能不與其傳統的儒學價值理念形成深刻的緊張，從而使其在「西方化」和「東方化」之間左右支絀。梁之標榜「調和中西精神」的鄉建運動，其反商品經濟、反都市文明、反法律文化的保守取向，以及其與共產主義「同其方向」（理想）而「分寸不同」（手段）的新禮樂運動的進路，反映了堅執儒家傳統的梁對現代性之欲迎又拒的矛盾心態。如果說鄉建運動是一個不新不舊、亦中亦西的矛盾體，那麼它的一切困境都源於其價值目標的內在矛盾。

鄉村建設作為梁漱溟求解「中國」問題和「人生」問題的方案，其宗旨在於規避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人文代價。誠如艾愷所言：「現代化是一個古典意

義的悲劇，它帶來的每一個利益都要求人類付出對他們仍有價值的其他東西作為代價。」²⁰對於東亞農業中國來說，由西方衝擊所導引的現代化進程，將以犧牲鄉土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方式和人文價值為代價。這對中國人來說不能不是一個痛苦的抉擇。梁所苦苦求索的「中國」和「人生」問題，歸根結柢即中國現代化及其人文代價問題，而鄉村建設則是其思想探索的「最後覺悟」。他試圖將「中國」與「人生」問題畢其功於一役，通過有限參融西方現代性的新禮樂運動，以圖鄉土中國的重建和倫理文化的復興，從而達致現代性與儒學傳統融合兩全的「新人類文明」。正是梁的儒家式人文關懷和其尋求現代性與儒學兩全的執着，困擾和滯礙了他對現代化的反應，使其陷入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二難抉擇的困境之中。梁的悲劇不獨為一個二十世紀之「士」的悲劇，而且是中國文化和現代化的悲劇。

鄉村建設運動在中國現代化的世紀行程中早已成為歷史陳迹。儘管它是革命時代的一場不合時宜的改良運動，但其運作的失措和歷史的風雨並沒有消蝕其深邃獨到的思想價值。梁關於鄉土中國和文化中國重建的運思，對於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現代化運動，仍不乏建設性的思想啟示。

古典中國的鄉土社會和倫理文化是一唇齒相依的共生體。倫理文化以鄉土社會為根基，而鄉土社會又本乎倫理文化秩序而構建。梁漱溟慧眼獨具地看到了鄉土中國與倫理文化的相互依存性，將「鄉村」與「倫理」歸為中國文化的兩大同構互動的根基，並且推論中國現代化的前途在於鄉土中國與倫理中國的復興。梁關於中國問題的一個獨到的看法是，中國現代化不應以摧毀傳統鄉土社會和儒家文化為代價，新文化的創造須以傳統社會和文化之「根」為支點。儘管梁的鄉村建設思想未能脫出「本位文化」論的窠臼，但其關於鄉土中國和倫理中國自我更新轉化的思路，無疑遠遠高於同時代自由派的西化論。現代化與其說是一個摧毀傳統的「除舊佈新」的運動，毋寧說是一個傳統創造性轉化的「推陳出新」的過程。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並不取決於學者書齋裏嫁接中西價值理念的文字或思想遊戲，而是有賴於鄉土中國之社會構造和生活方式的整體更新。

如果說梁的鄉建思想是一個既關注過去又矚目未來的矛盾的「兩面神」²¹，那麼其既難免應付現實環境的困頓，也具有超越時代的「大歷史」的宏遠眼光。關於中西文化，梁既看到了西方現代性較之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優勢，也看到了中國文化超越西方現代性之困境的後現代價值。他的鄉村建設旨在通過調和「中西精神」，以鄉土社會的重建為途徑而復興中國文化。梁堅持認為，儒學傳統既是中國現代化的現實根基，也是其超越西方現代性的精神資源，中國不能因現代化的現時功利而擯棄優秀的傳統遺產。隨着文明的進步，後現代社會困擾人類的將不復是物質生存問題，而是精神和諧或人際關係問題，而儒家文化的超越性價值正在此。應該說，無論梁的理論如何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但其關於儒學之後現代價值的見識是不無深見的。時隔半個多世紀的改革開放的90年代，費孝通先生預言，二十一世紀中國和人類所面臨的挑戰，將由「生態」問題（物質生存）進到「心態」問題（人際和諧），新世紀將需要孔子式的思想偉人。費先生的見解可謂梁的「中國文化復興」預言的回響。

梁漱溟秉承的儒家「經世」和「弘道」的學生關懷，使其執着於「中國」（社會）問題和「人生」（意義）問題，不能不使他陷入了二難抉擇的困境。這種思想困境在梁表現為歷史理性與價值理念之間深刻的內在緊張。

中國社會的發展具有迥異於西方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國的現代化雖肇引於西方文明的衝擊，但其成功則有賴於在中西歷史文化會通基礎上的中國現代性的生成。二十世紀的中國現代化運動經歷了一個由「西化」到探尋「中國現代性」的曲折過程。梁漱溟鄉村建設的儒家社會主義模式，其反西方現代性的道德主義取向儘管失之於迂闊保守，但其關於工業與農業協調、都市與鄉村和諧、倫理與法律融和、個人與群體平衡的中西文化綜合創新的思路，應不失為探索中國現代性的寶貴理論遺產。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中崛起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鄉鎮企業，以及鄉土社區的「小城鎮」化，正在成就舉世矚目的鄉土中國創造性轉型的獨特歷史經驗。中國農民的這一創舉自然並非出自理論家的設計，但梁半個世紀前關於中國「鄉村工業」和「鄉村都市化」的構想，卻是不無遠見卓識的。甚至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模式，如果透過其表層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迷霧，我們也仍不難窺見其探索鄉土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國現代性」因素。同時，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也決不意味着以西方現代「法律文化」摧毀中國傳統「禮俗文化」。張藝謀新近飲譽世界影壇的《秋菊打官司》，實為一則關於當代中國文化矛盾的電影寓言，它喻示了鄉土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倫理與法理的衝突，並呼喚融會東西方文明的中國現代文明的誕生。誠然，中國文化必須經歷「法理化」的轉型，而且現代「法」文明之後也未必是古典「禮」文明的復興。然而，中國文化的法理化必須以倫理中國的禮俗文化為基點，並以此作為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超越西方現代性的精神資源。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和現代化的進程，預示着鄉土中國的轉型和中國文化的新生是一個同步的過程，表徵「中國現代性」的華夏新文明，將在鄉土中國和文化中國的創造性轉化中生成。

梁漱溟鄉村建設的儒家社會主義模式，其反西方現代性的道德主義取向儘管失之於迂闊保守，但其關於工業與農業協調、都市與鄉村和諧、倫理與法律融和、個人與群體平衡的中西文化綜合創新的思路，應不失為探索中國現代性的寶貴理論遺產。

註釋

①③ 《梁漱溟全集》卷一（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頁602；615。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梁漱溟全集》卷二，頁161；200；278；434；467；511；567；573；574；575；581；581；166；337；482。

⑭⑮ 《獨立評論》118號；126號。

⑲⑳ 艾愷：《最後一個儒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35；284。

㉑ 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頁212。

高力克 1952年生，北京師範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浙江大學哲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著有《歷史與價值的張力》等。